

梁 张  
晨 浩  
李 中 清 等著

# 无声的革命

北京大学、苏州大学  
学生社会来源研究  
1949—2002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014004298



G647.32  
29

# 无声的革命

北京大学、苏州大学  
学生社会来源研究  
1949—2002

梁晨 张浩 李兰  
阮丹青 康文林 李中清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书店



北航

C1691032

6 647.32  
29

Copyright ©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本研究得到了香港科研资助局的项目资助（项目号：HKBU2247/06H）。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提供了部分支持。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  
美国密歇根大学、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都为项目的进展和具体研究提供了  
多方面的物力和人力支持，在此谨致谢忱！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  
1949—2002 / 梁晨、张浩、李兰、阮丹青、康文林、李中清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8  
ISBN 978-7-108-04700-7

I . ①无… II . ①梁… III . ①高等学校－招生制度－  
研究－中国－现代 IV . ①G647.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9232号

责任编辑 曾 诚

封面设计 蔡立国 薛 宇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8月北京第1版

201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 20.75

字 数 250千字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49.00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 前言 透过数据，发现“革命”

“二战”以后，随着人权与平等观念在全球的普及与重视，全世界各国政府几乎都力图建设起一套合适的全民教育制度与社会精英选拔机制。在保证本国人才储备和国家竞争力的同时，实现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使教育真实有效地成为中下阶层群体的“上升阶梯”，从而达到本社会的公平公正与和谐稳定。而根据早期的一些经典研究，延续千年的中国科举制度在打破门第限制，帮助“寒门出才子”，实现“按才取士”方面似乎富有成效，其相关经验与模式也由此一度为全球学界和社会所重视。

20世纪40年代以来，以柯睿格（Edward Kracke, Jr.）、潘光旦、费孝通等为代表的中美两国学者，几乎同时开始关注起中国科举成功者的社会来源问题。形式上，科举功名需要依靠本人的勤奋与天赋方能获取，且不能直接遗传给子代，而其他区分个人社会地位的因素如财产、血统等却是由家庭占有并可以直接继承下去，因此学界普遍认为以长期学习积累和严格客观考试为基础的科举能够促进社会流动。何炳棣在其1962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中，就指出明清科举成功者中有40%左右出身于前三代无功名的寒门之家，中国教育与政治精英的来源相当多样化，社会阶层间具有较强的流动性。在他笔下，科举制是全世界独一无二、延续千年的通过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典范。

1980 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科举制度实际的社会开放程度产生了质疑，科举制作为教育促进社会流动典范的光环已然大为暗淡。不同学者从地方到全国的研究共同证明如果考虑家族与姻亲关系，则明清以来科举的真正获益者可能不过三百个左右的大家族，而且还高度集中在江南、直隶等少数地区。艾尔曼在对科举所作的全面和总结性的研究中，认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科举制在知识门槛和学习长度上预设的程度过高，早早地将小家小户乃至众多“无产者”拒之于门外了。<sup>[1]</sup>用今天的话语来解释，即尽管客观考试的正面作用不可否定，但由于科举制无法实现社会中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或教育普及，其对社会流动性的促进作用也就显得非常有限了。

晚清以降直至整个民国时期，中国的教育普及比科举时代还有所倒退。一方面这一时期新式学校的数据与学生人数都过少。另一方面，相较于过往的书院、私塾体系，新式学堂的学费、杂费和生活费都要高出很多，即便是相对便宜的国立大学学费也不是普通家庭所能承担，这使得学生在人口中的比例甚至低于科举时代绅士阶层在人口中的比例。<sup>[2]</sup>尽管客观性考试作为传统得到了坚持，但由于大多数时期各大学都是自主命题，考场也最多只设置于两三个大城市，居于“僻壤穷乡”的学子无论在知识准备还是参加考试的便利性上都有着先天的困难。加之教育的经济门槛一直很高，通过教育促进社会流动显然无法实现。

科举制的光辉已然不再，民国时期的状况又如此不尽人意，历来有“重教”传统的中国还能在教育促进社会流动方面为全世界提供更有效的经验和令人信服的模范吗？20 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共及其

---

[1] 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0.

[2] 应星：《废科举、兴学堂与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战略与管理》，1997 年第 2 期。

领导下的社会革命似乎是最值得期待和最有希望达成此目标。一方面，中共成立以来在各时期都反复明确其革命目标是要“消除旧有的社会结构和一切的社会不平等”，“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劳动者至上或是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另一方面，自1949年以后，教育普及和“教育向工农开门”成为全国教育界最重要的口号和方针。国家不仅加快发展各级基础教育的规模，努力提高适龄青少年，尤其是工农子弟受教育的机会，更是直接出台了许多相应的照顾政策，保证各级学校中的工农学生比例。例如江苏的苏州地区在招收初中生时曾规定工农成分的学生满140分即可录入，一般成分的学生则需要180分，而地主、富农和工商界等原先优势阶层的子女则需要240分才能录取等等。在大学招生时，国家也明确要求当少数民族学生、华侨学生、复员军人以及工农毕业生和烈士子女与其他考生成绩相同时，要优先录取。许多高校的重点专业甚至只对工农及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开放。到1960年代前后，像江苏很多地区中等学校中，超过80%以上的学生都是工农成分，大学里也有类似情形。表面看来，一个工农当家做主的理想社会正在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

不过，历史总是存在两面性，1949年以后中国教育的真实状况非常复杂，许多与以上叙述截然相反的事例与证据表明，教育体制内依然存在着诸多或明或暗的不公平因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改革的实际效果，学者们也因此产生完全不同的看法。首先，新中国建立后全面推行的家庭成分划分和干部制度等尽管看似有效地改变了过往的社会结构，但阶层或社会群体间的差异不仅没有消除，甚至有所强化。1950年代末期推行的户口制度，更是导致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和城乡差距的不断拉大，使得农民子女获得良好教育的可能性大打问号。

其次，尽管国家在努力推进教育普及，但限于城乡、地区间原

有经济基础、教育条件差异巨大，政府自身投入能力有限，又明显倾向于城市，教育在城乡、地区等地理维度上的分布不均衡或不公平依然很明显。

再次，作为政治革命的领导者，党政军系统的干部子女的受教育状况要明显优于一般社会子弟，使得社会大众的不公平感强烈。一方面，一些革命领导者子女在1949年以前迫于现实环境，很难接受到良好教育，而1949年以后在父辈们的关心和照顾下，他们直接获取了接受良好教育甚至出国学习的机会。比如作为中共老革命和新四军的主要创建者郑位三的侄子，郑群忠在新中国成立前基本上没有读过书，1949年时他已经是18岁的青年，在伯父郑位三的安排下进入小学学习，后又进入湖北工农速成中学学习。仅仅5年后，郑群忠就被保送入北高俄语学院，并计划一年后去苏联留学。但1955年留苏名额大减，他的留苏计划未能实现，旋即被选送到北京大学法律系学习<sup>[1]</sup>，类似的例子在那个时代还有很多。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各级党政军机关、大型国有企业等或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条件优越的单位子弟小学，或与附近条件良好的中小学“结对子，搞共建”，在保证本单位职工子女良好受教育条件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同单位人群间受教育权的不公平。

最后，1977年的高考制度恢复被一些学者看成是新中国历史上大学招生“第一次从原则上不再关注一个人的身份（家庭成分）”，“强调公平竞争，择优录取，体现了一个公民权利的概念”。但过往高考招生时对工农阶层子弟照顾政策的消失以及经济发展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拉大，权力、关系与金钱等因素对社会公平不断冲击的现实，使得寒门子弟通过教育改变身份，实现向上流动

---

[1] 郑群忠：《好伯父郑位三》，载冯抗胜主编：《我们的父母》，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20—21页

的社会途径变得越来越狭窄。李春玲<sup>[1]</sup>的研究表明，1978年之后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逐步增强，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家庭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作用力不断加强。

实际上，这种认知也非常符合“国际潮流”。布迪厄以法国为对象的经典研究早已指出，占据相对优越社会地位的家庭，通过运用各自的社会、经济、文化或权力资本来影响子代的受教育过程，使其在考试中取得良好的考试成绩或评定，从而使他们的社会优势代代相传，由此布氏提出了著名的文化再生产理论。20世纪以来，大多数西方工业化国家开始实行强制性的初、中级义务教育，各教育阶段入学规模也均有所扩大。“二战”后，北美和欧洲的许多国家又广泛地出现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变革。很多大学的招生数出现了大幅度增长，大量新的大学在这一时期建立，很多社会的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时代。但文化再生产理论者的研究认为，“虽然教育扩张在低水平教育上实现了更大的平等，却无法降低精英教育的不平等；学校教育除了促使被统治阶层子女完成主流价值观方面的社会化外，同时也通过较高水平教育文凭将被统治阶层子女从职业结构中的优势位置中排除出去，以维持统治阶层的地位与特权”。实际上，“在某一给定教育阶段上，凭借自身优势条件，较高阶层总是教育扩张的最先受益者，只有当他们的需求已达到完全满足，教育扩张的好处才会轮到较低阶层”，这也就是影响广泛的“最大限度维持不平等”假说（MMI）。实际上，吴晓刚、李春玲以及郝大海和刘精明等学者近些年的研究，都倾向于认为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教育分层正显现出MMI假设的诸项特征。

面对复杂与矛盾的现象，证据扎实、论证严谨的学术研究就成

---

[1] 李春玲：《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9—2001）》，《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为了解事实本真的重要依靠。但对于 1949 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开放性这样一个兼具深厚历史沉淀和强烈现实关怀，且涉及面甚广的重大问题，获得足够的材料或真实的数据，完成有效的研究绝非易事。实际上，历史研究者普遍认为最好不要将最近几十年里刚刚发生的事件纳入历史研究范畴。这绝非是史学家们食古不化，“薄今厚古”。而是因为对于刚刚发生的事件，一来很多研究者也曾侧身其中，难以客观、平静地开展研究，二来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无法取得客观、良好的史料，在这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困境下，放弃或不触碰是最科学的做法。

最近十多年来，作为中国最精英大学的北京大学和江苏地方精英大学的苏州大学为我们深入理解 20 世纪后半叶的状况提供了可能。在李中清的倡议和推动下，自 1998 年以来，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先后与李中清研究小组合作，将两所学校现存的数十万学生学籍卡资料输入电脑，构建了学籍卡数据库。基于二十多年从事中国人口数据档案收集与研究的经验，李中清及其研究小组认为，学籍卡材料具备诸多优点，对于研究和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精英教育的生源构成和社会流动性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各高校所藏学籍卡片时间连续性强，涵盖学生完整，同时各校卡片内容相似，便于比较，蕴含着重要的学术信息。学籍卡为我们提供了学生的以下几项重要信息：民族、性别、父母单位、父母职业、家庭出身、家庭地址（或永久通信处）和主要求学经历（入学前毕业学校等）。少部分学籍卡还提供了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状况等内容。应该说，这些信息已经为判断一个学生的社会来源和教育上升途径提供了最核心、最重要的信息，为分析大学生群体的家庭的社会阶层属性与构成、地域来源组成、民族与性别比例，以及基本求学过程等重要问题提供了坚实的数据保证。

其次，相对于一般的调查数据（Survey Data），学籍卡等档案数

据（Archive Data）具有更准确、更客观的优点。学籍卡的填写者本身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学习能力，入学材料又是严肃的人生记录，学生本人在当时填写的家庭信息、求学经历等通常也是最准确的。因此，学籍卡资料可靠性高，具有一般材料难以媲美的史料价值。最近十多年，社会学家们在教育获得的研究上取得了较大发展，但研究材料多为人口普查资料或不同规模的问卷调查，而数量庞大的学籍卡数据，无论是数据的历史长度，还是信息填写的认真程度上，都要优于前者。

再次，学籍卡等数据库的针对性也要强于调查数据，能够更准确的理解数据所反映问题的成因与影响范围。国际学界对中国教育系统公平性的研究大多关注的是基础教育而非高等教育，少数研究者虽然注意到了高等教育，但由于利用的材料基本来自有地区局限性的社会调查或是过于宏观的人口普查数据，没有将本科教育与专科教育、精英与非精英大学区分开来，缺乏对中国社会职业群体与社会阶层历史变迁的关注，忽略了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的基本特点。

最后，相对于传统的史学研究法，构建数据库和采用定量计算，可以较好的克服材料与研究者的主观性。量化计算发现的规律或现象，并不依赖任何单个或正反方事件参与者的叙述，避免了表达上的主观与刻意；定量研究可以更好地避免研究者基于自身认知或经验所形成的预设观点对研究结论的影响，避免研究时的“先入为主”，得出的规律性现象或结论相对可靠。这对于长期处于“主题先行”发展轨迹中的中国史学研究意义重大。传统人文研究易受社会政治环境、研究者价值观、立场、信仰乃至视野等众多先赋条件的约束和影响，主观性较强，现有的很多史学结论难以经得起推敲。即如学籍卡研究所从属的中国近现代史领域，很多重要的结论“所依托的史实却是在匆忙中搭建，根基并不是很深”，这导致许多史实

失真，因此茅海建认为“史实重建”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首要工作。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强调，在历史研究中“凡能计量者，应尽可能作定量分析”，“盖定性分析只给人以概念，要结合定量分析才具体化，并改正概念的偏差”。

基于以上认识，在得到准许并协助两所大学建立学籍卡数据库后，李中清研究小组对两所大学新中国成立以来到2000年前后的本科生学籍材料进行了系统研究，依托两所大学较为连续和完整的材料，我们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新史实，其中主要包括：

第一，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基础教育逐渐普及和精英大学潜在生源规模的扩大，精英教育的生源构成相对之前大为开放。不管是北大这样的国家级精英大学还是苏大这样的省级精英大学，工农子弟、农村学生的比例都被迅速提高，甚至一度超越其他各类学生，成为大学校园中的大多数。

第二，19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精英群体的增加，来自具有经济或文化优势家庭的学生增多，精英大学名额的争夺更激烈，但精英大学中工农家庭学生的比例却依然相当稳定。两所大学的工农子弟总体比例保持在1/3到四成之间，基本与何炳棣对科举制所做最乐观判断相接近。

第三，尽管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十多年里，中国的精英教育保持了较高的生源多样性，促进了社会流动，但依然有很多学习以外的因素影响着广大适龄人口的教育机会。教育公平在很多方面还需要不断努力。比如，农村学生几乎都来自经济发达地区，越是欠发达地区，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就越大。

总的来说，两所学校所呈现出的五十年变迁，不管是相对于中国传统还是当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现实，在实现精英教育生源多样化，给予社会中下层子弟教育晋升途径方面都是非常突出的。在正式数据计算之前，作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精英教育应该在

改革开放后就已经越来越接近西方社会了，不平等问题应该较突出，但实际分析的结果却与此不尽相同。

根据这些发现，我们撰写了研究论文并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 2012 年第 1 期。文章发表后，引发了各类媒体的普遍关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不过一篇学术文章的承载容量毕竟有限，很多有价值的材料、结论等无法详细的在文章中呈现。这样的讨论在当下中国又广受各界关注，因此我们决定通过专书的形式将更多内容详细展现出来。

当下全世界都普遍认同教育在现代社会是个人实现向上流动的最重要的途径，但各个社会是否能实现或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让教育成为社会个体上升的途径才是更关键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的成绩与开放性，不仅相对于自身传统是成功的，而且也可能要优于当前高等教育水平更高的欧美发达国家。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的许多大学的录取方式一直是非常主观的和不透明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社会中上阶层，使得他们更容易利用自己在经济和社会上的优势将子弟送入精英大学，社会下层子弟只有在社会中上阶层受教育机会饱和之后，才能有获得精英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些现实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学习国外高等教育先进经验，尤其是美国招生经验的同时，我们需要保持一定的理性和警惕。

实际上，中国社会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对于教育文化和社会公平的认知存在很多根本性差异。在美国，甚至有部分中下层民众也认同不同教育的受众应该是有区别的，精英教育本身就应该服务于社会精英阶层。以李中清教授为例，他曾长期负责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招生。众所周知，加州理工是全美以及全球最顶尖的大学。他们曾经为一位中学成绩非常优秀的黑人青年提供优厚的奖学金，希望他进入加州理工学习。然而这位黑人青年却出人意料地拒绝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原因竟是他认为加州理工这样的

精英学校并不是为社会中下层子弟准备的学校，他这样的中下层子弟应该去一个普通得多的学校。这种情况在中国社会多少有点令人错愕。自科举创建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对通过刻苦学习、实现鲤鱼跃龙门的梦想怀有相当的憧憬和鼓励，进入更高等级的精英大学也几乎是全体家长和学生的一致目标。

最后，通过这一大规模数据库研究，我们除了想要向社会各界展示一些“出人意料”的结论，总结过往我们自己的经验，并对当下高考招生政策调整等作出点评外，我们还想说明，构建大规模数据，采用计量研究方法，对历史学研究是可以起到很好推动作用的。本书的研究正是在建立了大规模数据库，囊括了较全面人员信息的基础上，透过计算与分析，得出一些新结论并促使我们对现实重新思考。除了前文中提到的学籍卡数据的研究优点，我们还想进一步强调的是，依靠数据库建设和计量分析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可以实现对各类资料的一次性囊括，兼顾多方面的史料，从而较为准确地判断出各种因素的比例和影响程度；另一方面，还能较有效地考察各种社会影响因素间的关系，从而在发现许多传统研究无法得出的新史实的基础上，还能对这些新发现有初步的解释或指明可能的解释方向，有效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

# 目 录

前言 透过数据，发现“革命” .....	1
<b>第一章 引论 .....</b>	<b>1</b>
第一节 无声的革命：精英教育的非精英来源 .....	1
第二节 转变与延续：“无声革命”的三个历史阶段 .....	13
第三节 发现“革命”的基础：北大、苏大学籍卡 数据库的建立过程 .....	24
第四节 研究“革命”的手段：对历史材料的社会 科学化解读 .....	37
第五节 确定“革命”的维度：学籍卡变量及本书 内容 .....	46
<b>第二章 空间分布 .....</b>	<b>58</b>
第一节 地理位置：贫困地区的“从无到有” .....	59
第二节 城乡分布：农村生源的“从少到多” .....	78
<b>第三章 父母职业 .....</b>	<b>92</b>
第一节 分时期的职业结构变迁 .....	95
第二节 分地区的职业构成 .....	116
第三节 从“出身照顾”到“有教无类” .....	124

第四章 社会性别与民族身份 .....	143
第一节 社会性别：女生已占“半边天” .....	144
第二节 民族身份的差异性 .....	178
第五章 无声革命的关键：来源中学 .....	195
第一节 精英大学学生来源中学的集中化 .....	198
第二节 重点中学是精英大学生源的主要提供者 .....	210
第三节 教育普及与重点校制度 .....	217
第四节 来源中学生源的多样性是基础 .....	225
第五节 重点中学的利弊 .....	235
第六章 得失与未来 .....	239
第一节 从教育精英走向社会精英 .....	241
第二节 无声革命的不足 .....	256
第三节 无声革命的转变与未来 .....	263
附录 1 北京大学历年各省区输送学生数量 .....	278
附录 2 为北大输送学生前 300 的中学及其学生数 .....	281
附录 3 为苏大输送学生前 300 的江苏中学及其学生数 .....	291
参考文献 .....	301

# 图

图 1-1 中国各级教育入学率, 1949—2008 .....	18
图 1-2 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历年学生数, 1949—2002 .....	29
图 2-1 苏州大学历年江苏学生所占比例, 1949—2002 .....	63
图 2-2 北京大学分时期各省区输送学生数, 1952—1999 .....	65
图 2-3 北京大学分时期京外各省区所占学额比例, 1952—1999 .....	68
图 2-4 苏州大学分时期分市江苏学生比例, 1952—1999 .....	70
图 2-5 苏州大学历年江苏籍学生中来自贫困县与富裕县之比, 1949—2002 .....	71
图 2-6 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历年学生的城乡比例, 1949—2002 .....	81
图 2-7 苏州大学及其来源校城乡学生分布 .....	82
图 2-8 中国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1990—2003 .....	86
图 3-1 北京大学历年学生父母职业分布, 1952—1999 .....	96
图 3-2 苏州大学历年学生父亲职业分布, 1949—2002 .....	96
图 3-3 苏州大学历年农民子弟家庭出身情况, 1949—1985 .....	100
图 3-4 江苏省历年三类企业从业人数, 1978—2002 .....	104
图 3-5 苏州大学干部家庭学生类型分布, 1949—2002 .....	108
图 3-6 苏州大学分时期分市企业与党政干部家庭的比例, 1978—2002 .....	108
图 3-7 北京大学、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医学院历年学生数, 1952—1965 .....	126
图 3-8 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历年学生工农与非工农家庭的比例, 1949—2002 .....	132
图 4-1 全国历年高等学校女生比例, 1931—1947 .....	151
图 4-2 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历年学生 性别比, 1949—2002 .....	153

图 4-3	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历年学生分城乡的性别比, 1949—2002 .....	158
图 4-4	北京大学历年分学生父母职业的性别比, 1952—1999 .....	163
图 4-5	苏州大学历年分学生父亲职业的性别比, 1949—2002 .....	163
图 4-6	北京大学历年女生父母职业分布, 1952—1999 .....	165
图 4-7	苏州大学历年女生的父亲职业分布, 1949—2002 .....	165
图 4-8	北京大学历年男生父母职业分布, 1952—1999 .....	166
图 4-9	苏州大学历年男生的父亲职业分布, 1949—2002 .....	166
图 4-10	北京大学历年学生的学科分布, 1952—1999 .....	173
图 4-11	苏州大学历年学生的学科分布, 1949—2002 .....	173
图 4-12	北京大学历年女生的学科分布, 1952—1999 .....	174
图 4-13	苏州大学历年女生的学科分布, 1949—2002 .....	174
图 4-14	北京大学历年男生的学科分布, 1952—1999 .....	176
图 4-15	苏州大学历年男生的学科分布, 1949—2002 .....	176
图 4-16	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历年学生各学科的性别比, 1949—2002 .....	177
图 4-17	北京大学历年少数民族学生比例, 1952—1999 .....	179
图 4-18	北京大学各少数民族学生人数, 1952—1999 .....	185
图 5-1	北京大学历年输送 1-2 名学生的中学占所有输送中学的 比例, 1952—1999 .....	204
图 5-2	北京大学分省来源中学与输送学生数的比例关系, 1952—1999 .....	205
图 5-3	苏州大学江苏省生源各市来源中学与输送学生的比例关系, 1952—2002 .....	207
图 5-4	北京大学北京生源分区县学生比例, 1952—1999 .....	209
图 5-5	苏州大学江苏生源分市学生比例, 1949—2002 .....	209
图 5-6	北京大学历年学生中来自省重点中学的比例, 1952—1999 .....	216
图 6-1	全国历年干部学历分布, 1950—1998 .....	246